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二辑·第十二卷)

[宋]王安石
(1021年~1086年)

“荆公新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135 - 738 - 8

. 中... . 北... .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7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
[宋]王安石“荆公新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66 千字

ISBN 7 - 80135 - 738 - 8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26.30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BTE - book. 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二辑·第十二卷

[宋]王安石“荆公新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上 篇

王安石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

时代、生平和著作	(3)
(一) 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	(3)
(二) 生平和著作	(6)
“荆公新学”的学术渊源与为学旨趣	(13)
(一) “熙丰新法”与“荆公新学”	(21)
(二) 改革时代对理性精神的呼唤和对主体价值的肯定:“荆公新学”的社会历史背景	(28)
(三) 王安石的回答——身心性命道德义理之旨的提出	(59)
教育改革和教育主张	(89)
(一) 改革科举考试制度	(89)
(二) 改革学校教育制度	(93)
(三) 置经义局、撰《三经新义》	(98)
(四) 教育理论主张	(102)
(五) 义理之学 教材演论	(108)

下 篇

王安石教育文论选读

王安石教育语录分类解读	(169)
(一) 关于哲学观点和人性论	(169)
(二) 关于教育目的与作用	(177)
(三) 关于教育方法和教材内容	(181)
(四) 改革科举制度和改革学校教育内容的主张	(185)
王安石教育文论选读	(188)
送孙正之序	(188)
伤仲永	(189)
与马运判书	(190)
鄞县经游记	(190)
上相府书	(191)
先大夫述	(191)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	(193)
上运使孙司谏书	(194)
善救方后序	(196)
省 兵	(196)
通州海门兴利记	(197)
金谿吴君墓誌铭	(198)
辞集贤校理状	(199)
辞集贤校理状二	(200)
桂州新城记	(200)
上执政书	(202)

上欧阳永叔书	(203)
上欧阳永叔书二	(204)
上曾参政书	(205)
答王深父书	(206)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207)
与逢原第一书	(226)
寄赠胡先生并序	(227)
度支副史应题名记	(228)
相度牧马所举薛向鴆子	(229)
唐百家诗选序	(230)
除知制诰谢表	(232)
上时政疏	(232)
曾恐作仁寿系太君吴氏墓志铭	(234)
虔州学记	(235)
答韩求仁书	(238)
辞赴阙状	(239)
辞赴阙状二	(240)
辞赴阙状三	(240)
上富相公书	(241)
庙议鴆子	(241)
论孙觉令吏人写章疏鴆子	(242)
乞制置三司条例	(243)
进戒疏	(244)
答吴孝宗书附录	(245)
答手诏封还乞罢政事表鴆子	(246)
答司马谏议书	(246)
答曾公立书	(247)
祭欧阳文忠公文	(248)

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谢上表	(249)
周礼义序	(249)
诗义序	(250)
书义序	(251)
洪范传	(251)
书洪范传后	(266)
进洪范表	(267)
乞改三经义误字鴒子二道	(268)
答手诏言改经义事鴒子	(269)
改撰诗义序鴒子	(269)
进字说鴒子	(269)
进字说表	(270)
熙宁字说序	(271)
进字说	(272)
答吕吉甫书	(272)

上 篇

王安石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王安石是我国北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这已为历史所公认,但作为教育家,在教育史上尚未给予重要的地位。列宁曾经指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也是指他在政治方面的改革而言。

王安石在执政的8年中,对社会的政治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新法”和“新学”。“新学”是“新法”的根据,又为推行“新法”服务。“新法”基本上是适合北宋中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反映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要求的,但它触犯了大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守旧派的反对。然而,新法所实行的措施,有一些在以后还是保持下来,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一定的促进作用。清颜元给王安石的评价是:“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其行法……皆属良法,后多踵行。”王安石“新学”的唯物主义思想,震撼了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他所修撰的《三经新义》,一时为学者所传习,有司并用以取士。宋苏轼承认王安石的学术地位,说他是“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这是指他学识广博精深,并有独特的见解,能推陈出新,有创见有发展。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以“新学”为理论依据,阐发他的教育思想,对当时的教育和科举进行了改革,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通经致用的佐治人才。王安石的“新学”与当时的“洛学”(以司马光、程颢、程颐为代表)、“蜀学”(以苏洵、苏轼为代表)并称。“洛学”、“蜀学”与“新学”相对立。王安石的“新法”、“新学”以及教育、科举上的改革,引起当时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猛烈围攻。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攻击说:“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后来集理学之大成者朱

《列宁全集》第十卷:《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

《宋史评》。

《东坡外制集》卷上。

《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

熹也认为王安石是“违本旨，弃旧说，惑异教，文奸言”。司马光为相，立即罢废新法，也禁止了新学，而王安石苦心孤诣经营的教育和科举改革，就全被推翻了。

在中国历史上，像王安石那样所提出的改革，对当时政治经济和教育发生重大影响的为数也不多。然而，历史上关于王安石及其改革的评价却起落不定。王安石死后，曾一度把他看成是“圣贤”，“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不久又被罢祀。此后几百年间，王安石几乎成为名教的罪人，误国的奸臣，这大约与朱熹把王安石说成是“迷国误朝”的罪魁祸首，并把一些诋毁王安石的言论编入《三朝名臣言行录》有关，后来读史者对这位“大贤”所录也就深信不疑。《宋元学案》把王安石的学术思想标目为《荆公新学略》，附在全书之末，不给以正统地位，其实也是对新学的贬落之意。杨希闵《熙丰知遇录》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为这种是非颠倒，造作语言，诬罔事实的历史公案，作出历史的论断：“荆公不萦情于禄利，有治效，能文章，……郁郁不获竟其志，而丛垢积谤，阅今五六百年犹未能静。呜呼，今古是非之争，未有过于论熙丰君臣者矣。……奸臣借以绌正人而洛党尤多，门人子孙欲雪其恨，则造作语言，诬罔熙丰事实，以见元佑之是，绍述之非，庶几党祸可解，获罪者可申也，其用心良苦。不料朱子偏信之，遂胪入言行录，元臣修史者，又信大儒所著，更不加核，据以入宋史，而是非遂一定不变矣。”

关于王安石其人，其新法，其新学，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的评价问题，数百年来是一个聚讼莫决的公案。这里仅就王安石的为人、治学态度、学术思想、教育思想和教育、科举改革等方面，作初步探讨和评价。

《朱子大全·谈两陈谏议遗墨》。

《宋史·王安石传》。

《王文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二。

时代、生平和著作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卒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享年65岁。元丰三年神宗封他为荆国公，故也称他为王荆公。

（一）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

北宋中期，国家“百年无事”，社会生活稳定，文化经济日益繁荣。到英宗朝，政治军事上的种种弊端暴露出来。边疆民族矛盾加剧，国内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如何充实国力，巩固国防，缓和阶级矛盾，保持社会安定，已成为统治阶级有识之士所关心的问题。

北宋王朝鉴于唐后期藩镇割据之害，便把兵力集中于京畿附近，巩固中央集权制，削弱边将兵权和边防力量。因此北方辽和西方夏的政权，一直与北宋并存，长期时常入寇，骚扰边境，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真宗为了取得一时苟安，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每年向辽输纳币银数十万两和绢数十万匹；又与西夏结和，每年赐银、绢、缣、茶等共数十万。仁宗年间，为了抵御外患，增兵至120多万，8年间增兵至6倍之多。此外，宗室官吏受禄者，每年不断增加，以仁宗朝来说，每年就需银1200余万缗。国库匮乏，国家财力穷困，势不得不竭民膏脂，以资维持，以给军饷，人民不堪负担，生产趋于凋敝。王安石对此屈辱求和以图苟安的政策，极为愤慨。

国内的阶级矛盾表现为封建统治者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豪族地主和官僚贵族的兼并情况十分严重，形成了“富者有弥望之田，

贫者无卓锥之地”的局面。残酷的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封建赋役和官吏的巧取豪夺，使得广大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一些中小地主，也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和负担不起沉重的赋役，频频破产。加之南北水旱灾患相因，灾民流亡失所，“市有弃饿婴”，“百室无一盈”，死者白骨遍野，生产遭到破坏，人民沦于无以聊生的境地。

王安石认为造成这种内外交困、“积贫积弱”局面的原因是：

- (1) 当政者不知效法先王之法度；
- (2) 俗吏俗儒因循苟且；
- (3) 豪族大地主兼并与掠夺。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法先王之意、以改革当时之弊政弊法”。法度不改，兼并不摧，就不可能改变这种混乱、剥削和贫困的局面。然而，要改变这种弊法弊政，最大的阻力是“俗吏”和“俗儒”，俗吏乱政，俗儒保护“兼并”。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又说：“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所以要变法，首先就要制造舆论，提出变法的理论根据，揭露当时俗吏的腐败，抨击一般俗儒的顽固保守。他敢于同“俗吏”、“俗儒”展开论战，提出变法的思想。他说：“人言固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他在任地方官时所逐渐形成的哲学思想和变法主张，便成为他后来坚决实行变法的思想武器。

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是讲治道，摧兼并，实施裕民和惠民的政策。

《临川先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一二,《发廩》。

《临川先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一二,《发廩》。

《王文公文集》卷第八。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第七五卷。

《长编纪事本末》第五九卷。

裕民和惠民是儒家实施治道的一贯思想。这种思想早见于经史文献。《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无逸》说：“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礼》提出以“九戒”（谷、牧、百工、商贾等）任万民，是王业之基。孔丘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又对冉有说：既庶矣，“富之。”王安石提出了“三代于百姓，公私无异财”和“愿见井地平”的希望，主张耕者必有其田，使农民富起来，反对重税赋和横加暴敛，特别是要禁止兼并和掠夺。这就是他所想望的善法和善政。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积贫积弱的形势，以图长治久安。由于王安石本人的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他认为推行善法善政，只有依靠加强和巩固皇权来实现。这时神宗正面临着皇权与豪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亟待解决，便用王安石为得力的助手，于是一场中央集权制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改革，也就是“新法”，就此开了端。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有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条约、保甲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和市易法等。例如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条约是利用国家控制钱谷，发放农民信贷，补助农民解决口粮问题，同时兴农田水利，发展生产，挤掉兼并之家的豪夺，也就是“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哀多益寡，而抑民豪夺”。又如募役法的意图，是不分等级和贵贱，对国家公共职能所负的职役平均起来，反对官户、贵族的特权，卫护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贵族官僚攻击王安石是破坏祖宗法规的“大奸”。其它诸法虽各有利弊或缺点，但总的来说，新法确是沉重打击了大地主和豪族官僚，并给农民和中小地主带来了一些好处。

王安石的教育思想、学术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是密切联系着的。

《论语·颜渊》。

《论语·子路》。

《文集》卷四，《兼并》。

《文集》卷一二，《发廩》。

他的教育思想是因政治经济的改革而产生,并为政治经济的改革而服务的。他在《洪范传》与《夔》等文中,一再阐明国家最急之务是“裕民”,然后“教民”。他说:“为政于天下者,在于富之、善之。”富之然后善,何也?所谓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谓富之然后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继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两家,时人斯其辜’也。”又说:“民窘于衣食,而欲其化而入于善,岂可得哉?故命弃以为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则岂可以无教哉?故次命契以为司徒也。”他认为,富民的政事在于“理财”,理财就是创造物质财富,但同时还要施以“教化”,培养懂得政治经济的人才。把“政”“教”两者结合起来,这就是王安石政治思想与教育思想的统一。他反复强调,要改易弊法弊政,推行新法新政,其关键在于培育人才,有了适用的人才,新法方始可行,所以培养人才是为推行新法作准备。他多次指出“陶成天下之才”的重要性,并说要培养“为天下国家可用之才”,就“无不在于学”,归根到底是要改革教育,办好教育。他初见神宗时,就劝说神宗应“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设施之方,不言而自喻”。这是王安石政治思想与教育思想统一的一贯思想。至于培养怎么样的人才以及如何培养人才,他有一套较完整的想法,并提出了具体措施,而且付诸实践。

(二) 生平和著作

王安石出身于小官僚家庭。父亲王益,进士出身,历任州县地方官吏多年。王安石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王益身边度过,王益的

《王文公集》卷第二十五,《洪范传》。

《王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六,《夔》。

杨希闵:《王文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二。

思想与吏治作风对他一生都发生很大的影响。王益极重视对他的教育，“居未尝怒笞子弟，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这对他后来为人处事和从事各项改革工作，也具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王益一家生活靠官禄来维持，所谓“仕则有常禄，而居则无常产”，“舍为仕进，则无以自生”。王益死后，家道贫寒，内外数十口，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王安石在《忆昨诗示诸外弟》中说：“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王安石仕进以后，家庭的经济情况还是很困难的，他曾穷窘到连“奉养婚嫁葬送”的大事，都无力办理，有时为贫病所迫，感到“如坐烧屋之下”。王氏一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以及生活经历，使王安石比较容易接近一般平民和农民的生活，并了解他们的疾苦，因而疾恶和反对豪族官僚和大地主的兼并和掠夺。他在《感事》、《兼并》二诗中揭露当时一般平民和农民的疾苦情况：“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野败粟麦，欲诉嗟无赍。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感事》）人民在丰年尚且不能饱食，何况在水旱冬春之时呢？他又说：“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培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兼并》）这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历史根源。

《文集》卷七四，《上曾参政书》。

《文集》卷七七，《答张几书》。

《文集》卷七七，《答张几书》。

《考略》卷二。

《王文公文集》卷第五，《与孙侔书三》。

《文集》卷一二。

《文集》卷四。

王安石聪颖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他不仅文才横溢，而且少有大志，意气恢宏，在《忆昨诗示诸外弟》诗中说：“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落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寥寞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睇。”这时他只20岁，已经要“希踪稷契”，胸怀壮志，以天下为己任了。这成为后来他在政治和教育上做一番大事业的潜在动力。他一生刻苦钻研，从不懈怠，在任官职期间，仍孜孜苦读不倦。初及第为签判时，他常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办事，多不及盥漱。韩琦见他年轻，是个贤才，要收之门下。他认为，“韩公非知我者”，终不屈，拒绝了。这可见他既好学，又是一个自负很高的人。

王安石年22岁，得进士第，从此步上了政治舞台。庆历三年到嘉佑五年（1043—1060年），这18年中，除了其间三次还朝担任五年京官外，他做了多年州县官吏，做过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行政和司法工作。他生活简朴，自奉至俭，为官清廉，勤政亲民，关心人民疾苦。例如，梅圣俞《宛陵集》中有《赠王安石赴常州任》诗，描写王安石赴任知州的朴素作风说：“今君请郡去，预喜民将苏。每观二千石，结束辞国都，丝鞞加锦缘，银勒以金涂，兵吏拥后队，剑挝盛前驱。君又不若此，革鞞障泥乌，款行问风俗，低意骑更弩。下情靡不达，略细举其粗。曾肯为众异，亦国为世趋。”一个二千石的官吏赴任时，就要丝锦绚烂，金银闪烁，前呼后拥，威风凛凛；而王安石却不如此，他“革鞞泥乌”，“款行问俗”，关怀民情，细粗皆知。又例如，庆历七年（1048年），他做鄞县知县时，为鄞县起提堰，决陂塘，修水利，贷谷于民，而且兴学校，严保伍，做了不

《考略》卷二。

《考略》卷三。

《宛陵集》卷五。

少有益于人民的事；为了兴修水利，他在 11 天内走遍东西 14 个乡，巡视川渠河道的情况。后来鄞县人民为他建祠，以纪念他的亲民勤政。他做舒州通判时，提出了“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的主张，他说：“然闻富室之藏，尚有所闭而未发者，窃以谓方今之急，阁下宜勉数日之劳，躬往隐括而发之，裁其价以予民。”而且强调必须力行，他说：“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议，恐不足恤，在力行之而已。”他把“损有余以补不足”，提高到“天之道也”的高度，是很有见地和魄力的。他体恤贫民，就必然要损害富民，推行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道，就必然要反对兼并，而与豪族大地主处于对立的地位，所以他同豪族大地主的斗争，从他任地方官时就已经开始了。他在长期做官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朝廷的弊政，看到学校教育的废弛和科举制度的腐败，便总结了弊政弊法的危害，于嘉佑三年（1058 年）写成了《上仁皇帝言事书》，提出关于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的主张，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惴惴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又说：“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而趋先王之意，甚易也。”这成为他执政后推行新法和改革教育的指导思想。

熙宁二年（1069 年），王安石参知政事，居相位，制置三司条例司，着手推行新法；熙宁四年（1071 年），进行教育改革和科举改革，

《文集》卷七八，《与孟逸秘校手书四》。

《文集》卷七八，《与孟逸秘校手书四》。

《考略》卷六。